

LÜSIMIAN
WENXIANXUE CHENGJIU YANJIU



吕思勉 文献学成就研究

何 周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LUS 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吕思勉

文献学成就研究

何 周○著



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思勉文献学成就研究 / 何周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16. 9

ISBN 978-7-5461-5669-9

I. ①吕… II. ①何… III. ①吕思勉(1884—1957) - 文献学 - 研究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3840 号

责任编辑 张向奎 屠 涛

装帧设计 熙宇文化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230071)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10.5

书 号 ISBN 978-7-5461-5669-9

定 价 25.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book.taobao.com>)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序

这本小册子是我在安徽大学历史系攻读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时的学位论文,今天不揣浅陋,加以修改出版。回头看看,感慨良多!在这个功利的时代,钻研这样冷僻的学科,真是太难了。如果一开始就知道那三年要付出那么多精力和心血,我或许就没有勇气去攻读这个学位了。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这本小册子能出版,要感谢很多人。首先要感谢先师张子侠教授!他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今天我能写点东西,都要归功于老师的教诲与帮助。这个题目是在他的引导下选定的,文章的结构、框架、内容以至写作进度安排,他都有严格监督指导。他在繁忙的教学、学术和行政工作之余,在我的论文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多少次,在老师的书房、办公室,老师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只是自己生性愚钝,努力又欠缺,因此,离老师的期望差得太远。老师本打算让我于2012年元旦把初稿交给他,他想趁元旦假期有点空帮我审阅。可是,老师却于2011年的最后一天在办公室工作时,因过度操劳,英年早逝。现在老师走了,我要以老师为榜样,在中学的讲台上,努力育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尽绵薄之力。

张老师去世后,承蒙徐国利教授不弃,将我收入门下。徐老师也是我攻读硕士时的老师,素以严谨认真闻名。交到他手里的初稿还很不成熟,徐老师对初稿进行了大力斧正,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后来又在百忙中,不辞辛劳,几次为我改稿,为我这篇论文的完成,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本文准备出版时,徐老师还叮嘱我要好好修改,使之提高到立言的高度,并为此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感谢带过我专业课的刘信芳教授、吴春梅教授、张金铣教授、卞利教授、陆勤毅教授、周致元教授,他们在专业学习和为人处世上,给了我终身

受益的教导！感谢安徽大学历史系的刘家友书记和米学芹书记，以及其他老师对我的教导和帮助！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张耕华教授，他在吕思勉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 and 很多思想启迪。在写作最困难的时候，还有幸得到张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他馈赠了最新的吕思勉研究论著和重要资料给我，并在电子邮件中说：“在现今史学界，你发表的有关吕思勉的论文是最多的，称你为吕思勉研究的专家，也不为过！”这是他对素昧平生的后学的鼓励，却支撑着我在前路迷茫时咬紧牙关，蹒跚前行。

感谢安徽大学以及历史系，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感谢安徽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们，为我提供了查找资料的方便。感谢李新军、周良发、郭晓燕、王箐、李磊、唐建兵、王宇松等同学，在前途未卜的日子，我们一起走过。

感谢论文评阅和答辩委员会各位专家的辛勤劳动，使我的学位论文减少了错谬和缺漏，为论文增色不少。

毕业后，我在合肥一中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基础教育的工作异常繁杂，使我逐渐远离学术梦想，连好好修改一下稿子的时间都很难得。好在黄山书社的编辑屠涛老师对稿子进行了严谨认真的审阅，修正了很多错误。

何周

2016 年 9 月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吕思勉的目录学成就	013
第一节 吕思勉论目录学重要性	013
第二节 目录学专著《经子解题》	015
第三节 导读书目	020
第二章 吕思勉的辨伪学成就	029
第一节 辨伪学思想	030
第二节 文献辨伪实践	038
第三节 文献辨伪方法	056
第三章 吕思勉的史料学成就	065
第一节 史料的范围	065
第二节 史料的搜辑与鉴别	076
第三节 史料价值论	079
第四章 吕思勉的历史编纂学成就	093
第一节 史书体裁	093
第二节 古书通例思想	101
第三节 史书体例思想	109

第五章 吕思勉的历史考据成就	115
第一节 历史考据实践	116
第二节 历史考据的求真宗旨	118
第三节 考据方法	125
第四节 考据成就取得的原因	136
结语	139
主要参考文献	141

绪 论

一、相关范畴的解释与界定

本书从吕思勉的目录学、辨伪学、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考据学几个方面，对吕思勉的文献学成就进行探讨。文献学的学科范畴、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都没有很确定的理论结论，所以这里先要简单讨论一下本书使用的文献、文献学、文献学的学科体系等相关问题。

(一) 文献

今天学者给“文献”下的定义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的，史学界与图书情报学界看法不一，古典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学者又意见不同，基本的学科范畴都难确定，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必然困难重重。

“文献”一词，据现有资料，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后世学者理解不同。汉代经学家郑玄的注释是：“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①这里，郑玄将“文献”释为文章与贤才。这个注释广为流传，不过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这段话的注释是：“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②他并不直接注“贤”为“贤才”，这个注释与郑玄不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文献”的解释有段话：“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

^①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64页。

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①这里“献”的内涵就不仅是“贤”或“贤才”了，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稗官记录等，都可能是“献”。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中，把“献”理解为“耆旧言论”，包括世代相承的传说和文人学士的评议等，“过去封建学者们所强调的‘征文考献’便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探索于耆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②这个理解继承和发展了马端临的观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有学者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理解太陈旧了，不少学者的解释大大拓宽了文献的内涵与外延，不过仍然强调文献的文字性特点。如白寿彝先生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③洪湛侯认为：“凡是用文字表述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图书资料，就是‘文献’。”^④

以上的定义都注重文献的价值和文字特性，但有的学者认为文献的形态不一定只是文字的。王欣夫认为“文献指一切历史材料”^⑤。傅振伦说：“文献学是图书资料之学，包括口碑往事的追述回忆，不见经传的古事古物的再现、勘查，以及现在人类、民俗等调查在内。”^⑥现代图书情报专业的学者将文献的内涵拓展得更宽，这些学者把现代图书情报学的概念嫁接到传统的文献学学科上，给文献概念带来了新的面貌。他们试图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联通起来，但在实际操作上困难很大，至今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

本书讨论的近现代史学家吕思勉，主要的学术活动在民国时期，重要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自序。

^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页。

^③ 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④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⑤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页。

^⑥ 傅振伦：《中国古陶瓷文献学》，《景德镇陶瓷》1992年第4期。

的学术成果也是关于传统史学及传统学术的；同时笔者愚见，“文献”一词本身含古雅古典之意味，今人的某些所谓文献，应以“文件”称之更当，最好不滥用“文献”这一称呼。故本书对吕思勉文献学成就的探讨，着眼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概念，现代意义的文献概念不在探讨之列。

(二) 文献学

“文献”一词很早就出现了，但“文献学”一词出现则较晚，学者大都认为最早出现在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相望，亦私淑宗义，言‘文献学’者宗焉”^①。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②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是第一部直接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该书例言说：“本编亦采其谊，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③

作为一门学科，目前的“文献学”有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传统文献学等名称。不少学者认为，“文献学”是整理、研究古文献的一门传统学问，如张舜徽认为“文献学”就是过去的“校讎学”，“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讎学家，所以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④赵国璋、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辞典》提出：“古典文献学一般指广义的校讎学，即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又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⑤曾贻芬、崔文印则认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简言之，就是研究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注释、著录、校勘、辨伪、辑佚等的一门专科之学。”^⑥这些学者所理解的文献学还是属于传统文献学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③ 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例言。

^④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4页。

^⑤ 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

^⑥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的范畴。

有的学者不满足于传统的文献学概念,他们对文献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拓展。熊笃、许廷桂认为:“文献学学科专业的用书,理应兼包古今中外文献内容,除了文献目录、版本、校勘、注释、辨伪、辑佚等传统内容之外,还应包括文献的载体演变、记录方式、装帧形式;文献积聚、散失、整理、兴衰的历史;文献内容从传统到当代分类的变化;文献编纂体裁的分类;文献的检索方法、保藏方法、流通方式,等等。”^①杜泽逊认为:“文献学主要是研究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方法、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形成发展的历史、各种文献的特点与用途、文献的检索,等等。”^②洪湛侯认为:“文献学本是关于文献研究和整理的一门学问,文献形体本身的特点、文献整理的方法、文献学的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都应包括在内,简单地说,文献学应包括文献的体、法、史、论等几方面的内容,并把这些融为一体,进行系统研究,逐步建立文献学的完整体系。”^③有的学者提出了大文献学的观点,主张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

本书对吕思勉文献学的探讨,主要还是就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着眼的。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接触的仍然是传统的文献介质,应用的治学方法仍是传统的校讎学方法,很少有现代文献学的因素与方法。

(三)文献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

历史文献学是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等理论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同时,由于文献学分为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图书情报文献学三大分支,三者之间相互论争,也加剧了文献学学科体系的纷争。概括目前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有的学者认为文献学是传统学术,其体系近似校讎学的体系。1981年白寿彝先生发表《谈历史文献学》,首次提出历史文献学科建设的初步设想。他说:“历史文献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给它规定个范围。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包含这样

^①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页。

^③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的几个内容：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另外，还包括有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①

先师张子侠先生把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分成四个方面：（一）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二）中国历史文献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三）整理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方法，既包括传统的经验和方法，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辑佚、传注等，也包括20世纪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垣等人探讨和总结出的新的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以及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方法等；（四）中国历史文献学史。^②

王余光认为，文献学“在内容上，中国历代学者所做的工作有文献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包括文献源流、积聚、散佚及典籍体式等方面的研究，整理包括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类纂、目录、注释等。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是古典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文献学史的主要内容”^③。

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分四部分构筑文献学学科体系：（一）形体编：文献载体、文献体裁、文献体例、文献体式；（二）方法编：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编纂；（三）历史编：文献史和文献学史研究；（四）理论编：文献学家的思想。^④ 这个体系开创了现代文献学的先河，是文献学学科体系的一大发展。

以上各种文献学体系的意见虽然细节不同，但大体没突破传统文献学的领域。也有学者认同更宽泛的文献学体系，如刘跃进认为：“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古典文献学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最基础的学科，即所谓传统的‘小学’；第二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历代职官，这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略近于传统的‘史学’；第三是先秦几部经典，譬如《尚书》《诗经》《左传》《韩非子》《周易》《老

^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85页。

^② 张子侠：《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学基本理论的几点认识》，《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王余光：《再论文献学》，《图书情报知识》1997年第1期。

^④ 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目录。

子》《论语》《礼记》《楚辞》等,是所谓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之学;第四才进入各个专门之学的研究,如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等。”^①这里将经学和文学、哲学等学科都归入古典文献学,其体系就宏阔了不少。

有的学者更试图将现代文献学的知识纳入文献学学科体系,如倪波提出文献学体系包括:文献内涵、文献结构、文献信息、文献载体及形态、文献族系、文献类型、文献生产、文献交流、文献规律、文献工作标准化与现代化等。^②这个体系的创立是较早对传统文献学体系的拓展,为文献学体系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些学者(如潘树广、于鸣镝等)提出了大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设想,试图将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进行融汇整合,但困难很大。正如张永瑾女士所分析的那样:“文献学诸学科的整合也存在着不少有待进一步推敲的问题:首先,许多论著在探讨文献学的学科体系时常常有观点而乏论据,逻辑上的推论常常多于学理上的辨析,提出的观点或构筑的体系看似合理,但往往因不切合实际而被束之高阁。……其次,文献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因而文献学本身就具有交叉综合性学科的特点。但这是相对而言的,交叉综合不等于没有中心,没有边际,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无限扩展,结构体系无限开放,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而无当,使学科失去特色、失去自我。”^③

综合以上关于文献学学科内涵及体系的观点,笔者认为,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图书情报文献学都是古典文化这棵大树上的分支,无须互相敌视,最好有宽广的胸怀、高远的眼界,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不问疆界。本书根据吕思勉文献学研究的实践与理论,主要从目录学、辨伪学、史料学、历史编纂学、考据学等方面对吕思勉的文献学成就加以探讨。这几个方面都是广义文献学研究的范畴,学术界的意见可能不一,本书根据上述讨论的情况,决定从这几方面入手探讨吕思勉的文献学成就。吕思勉在版本、校勘、辑佚等方面的研究及其成就不多,加上篇幅所限,本书

^①刘跃进:《从文献学角度看国学研究的新起点》,《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倪波:《文献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目录。

^③张永瑾、袁轶青:《文献学的多途发展与学科整合》,《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7年第5期。

不拟专门加以研究。

二、吕思勉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一) 吕思勉生平及其文献学研究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生于江苏常州,1957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病逝于上海。吕思勉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的家庭,清初的先祖吕宫是清代常州第一位状元,《清史稿》中有传。高祖父吕子珊,是嘉庆顺天乡试举人。曾祖父吕佑逊,是道光乡试举人。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父亲吕德骥,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吕家世代读书仕官,到吕思勉已有数百年,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对他日后走上学术道路影响很大。吕思勉童年跟私塾教师读书,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开始系统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典籍。二十三岁后,专门倾力于史学。

吕思勉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和教育工作,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1909)、南通国文专修馆(1910—1911)、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1914)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其后,又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1922)、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1925)、上海沪江大学(1925—1926)等校任教。从1926年至1951年,他一直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51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他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教学之余,吕思勉坚持历史研究,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史学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少年时,信大同之说及张三世之说;青年时期,服膺法家学术;中年后,对马克思主义深为服膺。他一生写过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在社会文化史、政治制度史、民族史、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领域都有专著。还有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真正是著作等身。而且,字里行间总是透露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对国计民生的关切、对社会改革的热忱,足为后学楷模。他治学勤谨、淡泊

名利、谦逊质朴、诲人不倦,为人似古之纯儒。^① 吕思勉深深热爱祖国文化,刻苦研究传统学术,尽力传播祖国优秀文化,成就卓越。他一生颠沛流离,经历过日寇统治,先后失去三个儿子。小儿子吕正民病故后,他作挽联:“三世单传自兹而斩,将衰二老何以为情。”可见他何其悲痛!在这样国破家亡的境况下,他没有放弃对祖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抗战中,常州沦陷,日寇要市民向他们脱帽敬礼。吕思勉因此一直不回故乡,日寇撤离后,他才特意买了一顶帽子,戴着帽子,昂然回故乡。

这样一位品德高洁、博学多识、著作等身的史学大师,大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他却缺乏应有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他的史学成就往往被人忽视,他的思想往往被人误解。但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把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一并推重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分析了吕思勉名声没有另外三位大的原因,说实际上吕思勉的成就不在另三位之下。^② 因此,今天我们研读他的著作,体会他的治学精神,表彰他的学术成就,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吕思勉在文献学方面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说他是有成就的文献学家也不为过。他对目录学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有专著《经子解题》,还为初学者做了好几种指导书目;他有大量的辨伪思想,有的辨伪书,有的辨伪事,内容丰富而见解特立;他有丰富而独到的史料学思想;在历史编纂方面,他对史书体裁品评颇多,对古书的体例也有深刻认识,他自己的史著在体裁和体例上也独具特色。在历史考据学方面,他既有专门的考据论文,也有将考证成果有机融合在著作之中,如具有代表性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他还对考据学做了理论总结,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吕思勉的考据成就在某些方面与乾嘉诸老相比,也毫不逊色。总之,吕思勉的文献学理论和实践对于当代文献学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学术界相关研究述评

大陆对吕思勉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的过程。从 1957 年吕思

^① 吕思勉:《吕思勉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前言。

^② 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2 页。

勉逝世至20世纪80年代前,对吕思勉的研究几乎是空白。20世纪80年代后,吕思勉的一些遗作才开始被整理出版,吕思勉才又开始进入史学界的视野,一些回忆性、介绍性文章陆续增加,少量的专门性论文开始出现,张耕华还撰写了吕思勉传记。进入新世纪以后,吕思勉的研究逐渐升温,不少学人从通史、断代史、专史、史学特色、治史精神、治史方法和史学思想等方面对吕思勉史学进行较深入的探讨。但是,专门研究吕思勉文献学思想和成就的成果极少。下面,对学术界有关吕思勉文献学研究的成果加以介绍和评述。

陈其泰在《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一文中,对吕思勉的史著体裁特色作了介绍:“吕思勉所著《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共18章,下编共35章。尽管此书系按章论列,似与一般章节体史书相同,实际上它又明显地吸收了传统史书中的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吕氏所著的断代史,体裁形式也有类似的浓厚的民族风格。……吕思勉在体裁运用上有两项明显的意图,一是借鉴、改造纪事本末体,以反映历史演进的大势;一是借鉴改造典志体,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和典章制度的各个方面。”^①陈其泰的介绍是针对《吕著中国通史》的,其实吕思勉的几部代表性的史著都采用这种体裁。吕思勉的通史著作主要的有三部:《白话本国史》(自修适用),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国史》(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下册,194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6年上下册合并出版。断代史著作有四部:《先秦史》,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秦汉史》,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隋唐五代史》,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白话本国史》(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虽没有如《吕著中国通史》那样将此两部分内容截然分开,但把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都分成两块来写,先写一代大事始末,再写该时代重要的“典章经制”,也可看作是这种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

刘永祥的《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探讨了吕思勉的历史编纂

^①陈其泰:《20世纪史家探索史学民族风格成就举要》,《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学成就,指出《白话本国史》历史编纂的特点和成就主要有:第一,以进化论为指导,揭示历史发展大势,反映社会生活全貌并注重探究因果的编纂主旨;第二,继承而又突破传统历史考证方法以再现历史真实的实事求是精神;第三,对中国历史的宏观把握和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高超史料剪裁本领。《吕著中国通史》是对通史编纂的一次全新尝试,其特点和成就主要有:第一,汲取传统历史编纂营养,极富创造性地进行史书体裁的革新;第二,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加以熟练运用;第三,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史书编撰中广泛借鉴多学科知识。几部断代史的编纂特点颇为相似:首先,吸收通史编纂经验以构建周严完备的断代史编纂体例;其次,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描绘断代时期的社会全貌;再次,以通达的史识、深刻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① 这篇文章对吕思勉的历史编纂特点和成就的阐述是全面而深刻的。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生王婷婷在其学位论文《吕思勉通史编纂的成就及其价值》中,也探讨了吕思勉的历史编纂学成果。她总结吕思勉通史新编的特点为:独到的历史分期;创新的编纂体例;非同流俗的史料观;宽广的视野和综合分析的方法;革新史文;特殊的读者群预设;个性强烈的独立研究和创作。^② 作为一篇硕士论文,这篇文章的论述较全面,但给人感觉层次不是很清楚。

陈其泰主编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一书,有一节研究了吕思勉的断代史考证成就,就吕思勉的四部断代史的考证成就分别做了探讨,对其考证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③

周远斌的《吕思勉与〈经子解题〉》一文简单介绍了吕思勉的目录学大作《经子解题》。作者评价说:“《经子解题》一书,无论是就初学入门而言,还是就经、子研究而言,均是不可多得的力作……《经子解题》,所论

^① 刘永祥:《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② 王婷婷:《吕思勉通史编纂的成就及其价值》,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 陈其泰:《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256页。